



文化走笔 陆昌友

浙大在遵义的代理校长们 (下)



郭斌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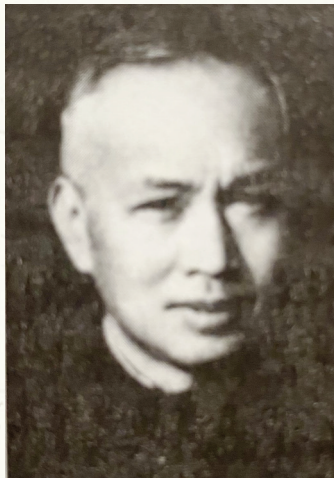
一次,浙大文系教授缪钺与系主任郭斌稣谈及时局,纵论时事,兴之所至,作五律一首。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未流方混沌,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助郭林宗。”

言下之意,是将郭斌稣比作东汉才高八斗却不接受官府征召而名著于世的士人郭泰。

1900年5月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郭斌稣,其父郭镇藩是清末一位德高学湛的贡生。这使他得以幼承庭训,饱读诗书;1917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文史大师柳诒徵,是为“柳门”弟子;1919年考入香港大学,1922年7月毕业后,留港一年,苦攻希腊文和拉丁文;1923年6月起,先后任教于南京一中、沈阳东北大学,有幸结识国学大家吴宓,加盟“学衡”;1927年考取庚款公费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受业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研读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与梅光迪同一师门;1930年,又转入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希腊文学;1931年春,学成归国的郭斌稣,以其中西合璧的完善教育,融汇新知与旧学的知识领域,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郭斌稣应竺可桢校长之聘,来到“学衡”派精英荟萃的浙江大学,参与了西迁办学的全过程。1938年8月,浙大奉教育部之命,在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史地系主任张其助鼎力举荐“学兼中西之通才”郭斌稣担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上任伊始,郭斌稣就编写了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依附,辞章有所归”为主旨的“课程



王国松

1954年,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王国松是在年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而这,也是他作为著名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一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1902年出生于浙江温州的王国松,表字劲夫。从小勤奋刻苦、学业精进。先是1916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温州最好的中学——浙江省立十中,四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跨进浙大前身——浙江公立工业学校,攻读电机科。后来,他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五年。1930年,王国松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公费留学。一年后,即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33年,再拿下电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重回母校,在工学院从副教授到教授,再到电机系主任,迎来了竺可桢校长执掌浙江大学,踏上了漫漫的西迁征途。

西迁途中,刚离建德,就频遭凶险。王国松考虑再三,在金华时暂别同仁,带妻子和五个女儿,折返回温州,把妻小安顿妥帖后,立即赶往吉安与大队人马汇合。而与家人的分隔,达五年之久。直到1943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历经艰辛,赶到遵义。

在遵义,寓居老城大什阁巷的王国松,是个尽人皆知的大忙人。他负责押运的仪器和实验设备刚到,马上就住在泰和、宜山一样,赶快组织拆卸,在老城东门外湘江河畔因陋就简建起的实验室里安装起来,及时开出实验课。除繁杂的行政事务外,他还要讲授“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机原理”“电机教学”“高压电力传输”“输变电工程”等专业课程。尤其是“电机教学”这门课程是王国松在国内大学首创,在国内外大学也少见。此课程由他自编讲义,以应用数学模式对若干电气现象进行解释、论证,在历届学生中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1942年下半年,工学院原任院长李熙谋离

4 “卓节独从容”的学者郭斌稣

草案”,在校内印发宣读,并在当年招收的文学院、师范学院两个国文系新生中开始实施。这个“草案”,倡导学问以致用为本,规定新生先博览群书,然后再求专精;这个“草案”既重国文写作,要求学生一律用文言写作文,又强调学生应中西学兼备。这些,是与竺可桢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一脉相承的。在宜山的第19次校务会议上,由竺可桢校长提议、郑宗海与郭斌稣两人附议、得到全体通过、正式“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其初衷,正是要在浙大形成“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学风。

1941年8月,著名音乐家应尚能受竺可桢校长之托,将马一浮撰写的歌词谱写成浙大校歌,随即在全校范围内传唱。为使浙大学生深刻理解国学大师马一浮所作歌词蕴藉的深邃涵义,同时,也为阐发“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郭斌稣撰写了《本校校歌释义》演讲稿,发表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他还按照竺可桢校长的安排,分别于11月10日在遵义丁字口庆华戏院、次年元月12日上午在湄潭玉皇阁、当天下午在永兴向浙大学生演讲,称大学生应“百川归海”“兼收并蓄,包罗万象”;大学的最高目的,是“求是”“求真”“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认识之明通”;大学教育,则“应养成宽广之胸襟,廓然无限,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叮咛”。这些见解,既是对马一浮歌词的直白诠释,又是对竺可桢办学思想、理念的深刻阐释。

1943年3月,浙大训导长张其助赴美讲学,经校长竺可桢推荐,郭斌稣接任训导长一职,在更高层次上参与校务处理,进一步成为竺可桢校长的得力助手。在3月8日湄潭纪念周的“训词”中,郭斌稣强调“训导”就是以德服人,其目的“不在训,而在培养学问空气”。

1945年2月17日至4月22日,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委托郭斌稣代理校长职务64天。这段期间的浙大,可谓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先是3月11日,学生自治会在何家巷三号的教室里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接着,16日,《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即《国是宣言》)在何家巷《生活壁报》张贴,随后印刷2000余份,发往全国各地;4月17日,学生们又酝酿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促进会”,欲发起成立全国学联;因物价上涨,部分学生要求增发伙食费及夜间照明灯油供给,引发罢课,并由遵义校本部波及湄潭分校及永兴的一年级。

5 国之劲松、植根教坛的工学院老院长王国松

开浙大,去了重庆的交大。王国松就顶着代院长的头衔,操持工学院的纷繁事务,直到1944年9月21日,被正式任命为院长。为确保电机、化工、机械、土木各系的实验都能正常开展,把分散在子弹库、西蜀会馆、陆军大学饭厅等处的实验室集中到次门外,他东奔西走,上下努力,总算将实验工场建成。在四个系都正常或增班招生的情况下,工学院于1945年增设航空工程系。据浙大教务处1946年2月统计,是年全校学生1199人,工学院学生就有556人,占46%;而是年的247名毕业生中,工学院毕业生136人,占55%以上;遵义办学七年间,光电机系毕业生就有150人。这些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王国松院长的辛劳和付出。

1944年4月10日下午,王国松代院长陪同前来造访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老城东门外参观了扩建中的工学院实验工场。近两个小时的参观,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遵义,王国松还是一个为师生带来光明、给百姓送来温暖,深受大家喜爱的好人。是他,用历尽千辛万苦从杭州迂运而来的柴油机带动发电机,以桐油取代价格昂贵且很难买到的柴油,发出电来,解决实验用电。因为他知道“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工程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又是他,把另一台小型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三号大院里,每夜发电三小时,让教室大放光明,使同学们的晚自习从昏暗的菜油、桐油或柏油灯光下解脱出来。还是他,带领电机系的同学,沿遵义城中大街上的石板路,统计路灯负荷、需用材料,编制供电网络,为遵义城市供电作出最早的规划。浙大东归回杭之前,是他将浙大实验、照明用的柴油机、发电机留在了遵义,促成1951年遵义第一座发电厂以此为基础,在狮子桥头诞生。

自1940年8月15日,工学院的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实验室向市民公开展示开始,每年6月6日的“工程师节”,次东门外的工学院实验工场,都向公众开放,遵义市民往往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以致眼界大开。此举一直持续到1946年,浙大离开遵义。这一持续七年,让遵义市民获益匪浅的活动,王国松应该是功不可没。而1944年“工程师节”实验工场向公众开放时发生火灾,还是王国松迅速赶到现场,果断“始停机器”,积极组织灭火,才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自1945年9月,竺可桢校长出差重庆、南京、杭州,为浙大东归复员奔走,一去就是两个月;后来再两次去重庆,时间又是一个月;然后是竺可桢校长离开遵义、返回杭州,到最后一批浙大师生离开将近三个月的善后处理,先后加

为应对这些变故,也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在短短9个教学周的时间里,代校长郭斌稣就主持召开了9次行政谈话会,1次学生代表谈话会,协调处理。其间,他专程去了一趟湄潭、永兴,协商灯油补贴,督导学生复课。为严肃校纪,他还通过行政谈话会,对虚报战地服务团用款的学生余xx以开除学籍处分;对在校期间违反校规、未婚先孕的男生俞xx、女生许xx,“囑即自动退学,若需转学,证件可照办”。

随着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心脏病日益加重,前往重庆、贵阳诊治,即便在遵,也难以坚持日常工作,郭斌稣又以代院长身份,处理文学院各项事务,直至梅光迪去世。

1946年元月10日,梅光迪去世不足半月,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记载:“四点,余晤郭治周(郭斌稣),告以文学院院长拟聘晓峰(张其助)主持,请治周任外文系主任,祝廉先(祝文白)为国文系主任。”原本志在必得的郭斌稣十分惊异,不但代理的文学院院长不能转正,就连当了近十年的国文系主任也难以连任,加上训导长一职也将另属他人。尽管心有不甘,但他还是顾全大局。第二天一大早,郭斌稣就赶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把文学院印鉴交还了竺可桢校长。

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郭斌稣与刚继任训导长的黄尊生伴随在主祭竺可桢左右,担任陪祭。他还为这位自己所敬重的哈佛同门、浙大同事撰写了《梅迪生先生传略》。这篇字里行间充盈着真情实感的祭文,与众多政要、同仁挽联、诗文一起,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40期——“追悼梅迪生先生专辑”,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学院院长一职的安排,或许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缺少必要的铺垫,不仅让郭斌稣心存芥蒂,在部分浙大师生中,也略有微词。学生代表江希和在梅光迪追悼会上的发言就“谈及文学院院长产生过于迅速,希望不要把干净的校园糟蹋了”(竺可桢当日日记)。而郭斌稣则久久难以释怀。直到4月1日浙大校庆十九周年纪念会上,郭斌稣的演讲中还在嗔怪竺可桢校长“用政治手腕不令其长国文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而调外文系”(竺可桢当日日记)。5月7日上午八点,郭斌稣一家第一批离开遵义,但他没有和同仁们一道回杭,而是离开浙大,去了南京,重回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就职,长期从事希腊文、拉丁文的教学与研究,直至1987年9月,以87岁高龄逝世。

名城诗坛

小语

家在黔北 (下)

家在黔北

或一杯抹茶的坦白
或一抹家乡的炊烟

听见乡亲们叫我“书记”

听见老乡喊我“书记”
“书记”“书记”“书记”
那语速,那寒味,那浓烈,那渴盼
如他们碗中冒尖尖的酱香
在我肩上升温,炙烤我

也如静谥的芙蓉江畔
芙蓉怒放
以生态之美审美读
背井离乡的驻村书记
之良知
之初心

芭蕉也歌唱

芭蕉用湿漉漉的正午联想蒹葭
芭蕉露出宽胸挡住雨滴

是这场芭蕉雨点燃了秋的缠绵绵绵
还有霞光万道
将世间黑白一分为二
或你或我

起雾时,我与山村并肩而立
听见芭蕉在雨中歌唱喜悦
那松弛的自由自在
全忘了汛期留下的细思极恐

遇见山村的芭蕉雨时
我一次次紧紧衣领和拳头
与沃土与山尖与鸟鸣
一次次将着百姓交办的实事

穿上草鞋

一对护膝已收到
我从村里的快递中转站取回时
绕过村委会
我特意在初秋的赶场天
买了一双结实的草鞋
我想,穿着入土时足下生风
还有一种成就感:
咱们遵义人
关于草鞋留下的红色故事
不绝如缕

高粱熟了

我每天做着把石头赶上天空的事
玉米高粱薏仁稻穗也赶上天空

我试着在腾空的土地上平整一个晒场
将所有秋事有棱有角地整飭
让鸟儿们盯着丰稔丰满与丰收
跃跃欲试

最后是我先跃跃欲试
我把山村的每一个细胞
灵动成一群鹭鹭
白白净净地飞出曲线
高粱熟透的样子酒容最懂
糯成赤水河的脸蛋

在山里看见的熟透的高粱
被风儿手摇着翻跟斗
一招一式也如此新鲜
如天空的湛蓝
在老奶奶手上穿梭
染色岁月金灿灿

听见蝉声

秋蝉被喊薄
薄如晚霞之衣袂

我们欲言又止的呢喃
在山里发酵
很快就要成为霞光
一如远山的古琴与你
被绘成淡紫
万物灵动

我躲进晚霞之下听见的蝉鸣
特别清脆
让游侠的风儿
在瞬息万变中回归
我转过身,乡村振兴的画卷
徐徐舒展

牵着自己奔跑

必须记住这最美的瞬间
将蓝色天空烧成一炬火焰的瞬间

那远处的秋日 and 炊烟是我的爱
面对它,我不敢太多抒情
“村事”总是顺着炊烟爬上天空
不急不躁
与日出、碧波、大山 同向

不用质疑这儿的真实
包括在大山里奢侈地拉着自己奔跑
或影子,或其他

村干部

早早回村
本想晒晒被子
到了后感觉太阳已隐退
一团一团乌云在村子上空
来回走动
随时有可能踏空而坠

我在空荡荡的村舍发呆
盯着演戏的天空
村干部们都回家收玉米去了
他们天天被汗水浸泡
期待今日无雨 今日周日
他们要去抢回 自家地里的秋天

晒席 晒天

最小的稻香轻轻舒展时
汇聚成一层薄薄竹篾匠心
晒秋,晒麦,晒椒
晒花生或葵花

老百姓赐予它的名字
更有意味和张力之外
更是心胸之开阔与豁达
叫“晒天”,装下宇宙的气场

“晒天”是最大的诗意
离泥土最近的名字有故事

“晒天”比晒席烈焙得多
测温收割
人勤春早,与民心民意

秋瓜

故乡是我丢失的那把抓鱼匣子
在我头顶的夜灯上晃动
如这干净利落的秋瓜
多情热烈

秋瓜阅人无数
弯弯曲曲那腰身
揽了好多好多夜螃蟹
月光下,山影下
等君入樽

那个在溪流里抓鱼和螃蟹的男孩
依然是我
无论怎样的斑驳或岁月冲刷
一招一式也如此新鲜
在敲带自珍与豁然醒悟之间

人生的每一束光亮
正如一秋瓜也如一鹰隼
还如桀骜不驯的螃蟹张牙舞爪

那些本性与愉悦啊
躺在故乡的怀里
尤其有母亲盯着的时候
淋漓尽致

赶集

花儿站池塘边享受阳光
摇着从鱼儿那里学来的自由与摆动
水,墨香
心情,闲暇

冬日茶花在湄江边的日子
开得潋滟
让塘边的鱼和云拥挤
做出压弯桥与村庄的架势
争着要去赶集,撒着娇

赶集是大山的特权
赶集这天的太阳或雨滴尤其热闹
人气让保洁员劳心之苦
扎堆成了微笑

山富足了,驻村人喜上眉梢
思考到了永不随波逐流
还学会了在热闹与喧嚣过后
盯着场子
左脑发呆,右眼神过滤
留下的狼藉与雪花片片

又逢三六九,我的家乡特别兴奋
鸡鸣最知今日赶场
一直照照攘攘

(全文完)